

注事

四十年前上大集

□余振中

20世纪80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的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富。集市是农村物资展示的平台,集上的物品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,反映出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热闹景象。

进入腊月,庄稼人都闲了下来,每到逢集,人们都像过节一样换上干净的衣服,骑自行车一拨一拨地往城里赶。集上早早就摆好了摊位。上集的人密密匝匝地挤了一街,摩肩接踵,那可真叫一个热闹。

卖布的街道人流特别密集。布摊上摆满了的确良、凡尔丁、条绒等种类的布匹,年轻的媳妇们挤在摊位前,挑选着自己喜欢的花色和布料,不时地贴在身上比划着,征求同伴的意见。紧挨着布摊的就是裁缝店。布买好了直接拿到店里,让裁缝量体裁衣,过几天就能穿上自己喜欢的新衣。过了布摊是成衣区,这里更是年轻人喜欢光顾的地方。那时候西服、夹克衫刚刚兴起,还有那种紧臀宽口的喇叭裤,小伙一穿,特显精神。姑娘们最爱的是新上市的高领毛衣,上身一试,曲线毕现,引来周围小伙子一片惊艳的目光。老年人还是习惯老式的中山装,穿上显得老成庄重。相邻的是专卖鞋袜的摊位,有三接头的皮鞋,有“踢死牛”的高跟鞋,还有军绿色的球鞋和白色的运动鞋,尤其是那种白塑料底的半高跟鞋,很受年轻人的青睐。

老街上有钉鞋、修鞋的,你拿着张了口的鞋过来,师傅拿着长针“哧哧”地缝上几针,在缝鞋机上“嚓嚓”地过一下,再抹上胶水,

立马就完好如新。街上还有修表的,你的表有毛病了,师傅戴上放大镜,像做手术一样,不大一会就手到“病”除。那时修东西的特别多,有修钢笔的,笔头坏了,墨水管烂了,换个零件就能用。还有修家电的,东西坏了一修就好,照常使用。

街口的理发店也是年轻人喜欢的去处,理发店门口挂着醒目的彩色招牌,墙上还有一个电动、带条纹的滚筒不停地转动着。那时候刚时兴烫发和卷发,赶潮流的姑娘结伴而来,一人烫一头羊毛卷,既兴奋又羞涩,出门的时候怕人看见,还要用纱巾把头发包起来……

邮局门口也是人来人往,络绎不绝,有的发信,有的拍电报,还有的打长途电话(那时还没有手机)。邮局旁边是个书摊,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,每期的《小说选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大众电影》,我早就预订了,卖书大爷特意给我留着,一拿上书如获至宝,免不了给大爷递烟道谢。

老街的另一头飘荡着节奏强烈的流行音乐,这里是卖磁带的摊位。磁带五光十色,有戏曲的,有相声的,更多的是李谷一、郑绪岚、李双江、蒋大为的歌带。人们翻着磁带,各取所好。老板还有一台双卡录音机,为顾客翻录各种磁带,比原声磁带要便宜得多,颇受村里人欢迎。

电影院门口是最热闹的地方,墙上贴着一排排新片的海报,年轻人早早买好了票,抢着时间一睹为快。看电影的多半成双成对,小伙子幸福地陪着对象走进影院,不管电影如何,两只相握的手总也舍不得放开……

公社门口是食品区,有煮油糕、麻花的,有卖凉粉的。上集的人都爱去醪糟摊,卖醪糟的老头往铜马勺里添水,小风匣拉得“啪啪”响,转眼就是一碗,热气腾腾,香甜解渴。上年纪的人喜欢泡上一根麻花,连吃带喝,滋润得很。我最喜欢卖热锅子的,煮肉的锅上面挂着羊架子的,煮肉的锅里冒着热气,翻着白色的汤汁,那香味远远地就往人鼻子里钻。来一碗羊肉泡馍,辣子油红油红的,又香又热乎,真是太过瘾了!熟食旁边是肉架子,有猪肉和羊肉,上集的人回家时捎上一吊肉,到家里让全家改善一下,有的还专门拿去孝敬老人,很受村里人的称赞。

老南街是农副产品和日杂品的市场。木匠师傅在出售自己制作的桌凳和案板,手巧的人出售着自己做的竹筐和笊帚。当家的人都会去那里转转,给家里添些家伙物件,然后再满载而归……

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年代,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,一个五彩斑斓的年代,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年代。集市是一个时代的缩影,它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,也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。它虽然没有现在的繁华,却让人能在细节中处处感受到一种心的跃动,感受到人们奔向新生活的热情和信心。它的存在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也为通向今天的繁荣开启了一条闪光的通途。尽管时光飞逝,那段岁月已成为遥远的历史,但它深深地印在一代人的记忆里,那种特有的温情和烟火味,将永远伴随着我们的心灵,走向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。

老照片

□樊晋英 供图



▲卫东饭店是第一家把自助餐引入运城的饭店,当时十分火爆。



▲八一饭店刚开业时也十分红火

那人

广州文联的安邑人
——追记我的三爸张绍杰

□张灶新

张绍杰,山西运城安邑人,1923年1月出生,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,1938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,先后在三五九旅、奋斗剧社工作了11年,长期在部队和地方文化艺术部门任职。张绍杰少年从军,参加革命工作,后来长期在外,与家乡失去联系。

张绍杰是我的三叔父,安邑话叫三爸。作为他的侄子,在此追记他的一些往事,作为对我们运城老文化人的一次补遗。三爸曾任职于广州市文联,他1987年离休,离休后继续担任广州市文联的顾问,同时被聘任为广东省文联主办的华南文艺业余大学常务副校长。

三爸在运城菁华中学上学时,深受老师的教诲和影响,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、解放华北、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。他1937年11月初正式被编入学兵队第四区学习,穿上了军装,佩戴上了八路军臂章,光荣地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。从此以后,为了保密,他很少在家里停留,只是在家里存放了几箱地下党的宣传单。当日本鬼子进村以后,他们根据掌握的情报,指名要抓捕地下党张绍杰,在村里无恶不作。当时我的母亲和家人把传单想方设法藏了起来。

在三爸离开家的日子里,我们家除了遭受到日寇的迫害,村里的一些人也不太理解。祖父和家人多年中承受了不少委屈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三爸从朝鲜回国,寄回了他的一枚奖章和一张奖状。三爸在广州工作多年,作为一名文化部门的领导,他热爱工作,曾经出版有一本专著《奋斗风云纪实》。

我曾经读过三爸的那本书,他在书中详细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村的愚昧落后,还有我们家曾经经历的一些生离死别。因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不足,过去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很苦,我的大伯,还有不少亲人曾经遭受过病魔的折磨,有的甚至夭亡。他还记录了参加革命以后所经历的种种危险,表达了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。

三爸在1987年曾经回家探亲。当时他写了不少文章,表达对家乡的热爱,还有对家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兴奋。作为一位老文化人,一位光荣的革命者,三爸永远是我们家庭的骄傲。

追忆

“一杆旗”地里苦与乐

□张俊英

实行土地承包制那年,我家在南沟边分了一块酷似梯形的地,地面高低不平,但有一个响亮好听的名字“一杆旗”。虽然是一块烂地,好处是离家近,用不了几分钟就走到了地头。我和老伴那时三十多岁,认准一个理,只要撅起屁股好好干,不愁长不出好庄稼来。我们拉上平车,扛上铁锹,起早贪黑铆劲干,铲除了杂草、灌木,垒高了堰边,整平了地面,施上粪土,在地里种上棉花。经过老伴精心管理,亩产皮棉近一百斤,我们用所卖的钱当年就还清了盖房的欠款。本队的永祥爸说:“这媳妇把苦下啷啦,我无论什么时候走地,她都在地里。”辛苦归辛苦,但我们卖棉花数钱那会儿,甭提多高兴。

1987年县上发展栽果树,我们在这块地里栽上富士苹果苗。但果树离不开水,当时村里仅西门口有一眼深井,需把水先抽到

烧瓦窑的水池,再用水泵顺着买来的四五百米的塑料管抽到地里。打农药用的是手压喷雾器,打一次药身上像泥人似的。还有环剥、疏花、疏果、套袋、修剪、施肥等多道工序,虽然麻烦辛苦,总比种其他作物收益高。那年果子卖了两万元,钱装在口袋里还没有捂热,村里的信贷员就上门说:“听说你家的果子卖了,把钱存了吧。”老伴也说:“快存了吧,咱现在也不急用。”一会儿工夫就办妥了手续,算是我家在银行有了第一笔存款。

2022年,果树进入了衰老期,失去了存在价值,只得把果树挖了,再在地里种什么,我们拿不定主意,后来想起在这块地里种上小麦。第二年清明时节,麦苗长得齐刷刷、绿油油,邻居说:“今年逮住啦,一亩起码能产一千斤。”趁一家人都在,我们给地里的麦苗喷洒了微肥和农药,拔去了田间的杂草。过了二十多天,家里二弟打来电话说:

“地里的西虫(麻雀)多得不行,不管就吃光了。”我和老伴急忙收拾行李回村,想了很多办法,每天不知往地里跑了多少回,但收效甚微。我无可奈何坐在地头的杏树下,在手机上写了一首打油诗——《麦田有感》

五月里,麦儿黄,小雀老鸦猖了狂。心急火燎赶回乡,乌口夺食要保粮。扎草人,挂彩帐,甩鞭子,铁锣响。雀儿虽小鬼得很,处处和人捉迷藏。你在东,它西往,瞧见无人就哄抢。世上事儿难完美,尽心尽力不后悔。

过了“小满”节气,麦子逐渐成熟,麦粒硬了鸟儿也不再吃,飞到别处去了。这时又要“龙口夺食”,只怕下雨,每天晚上看天气预报。有一天听说村里来了一台收割机,我急忙找人去联系,收割机进了地,才算是松了一口气。用三轮车把来之不易的粮食拉回家,一看足有两千斤,够一家人吃一年。家人们围着粮堆,捧着金黄色的麦粒,心里乐开了花。